

段忠桥 主编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 趋向统一的理论

[美] 莉丝·沃格尔

( Lise Vogel ) 著

虞晖 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段忠桥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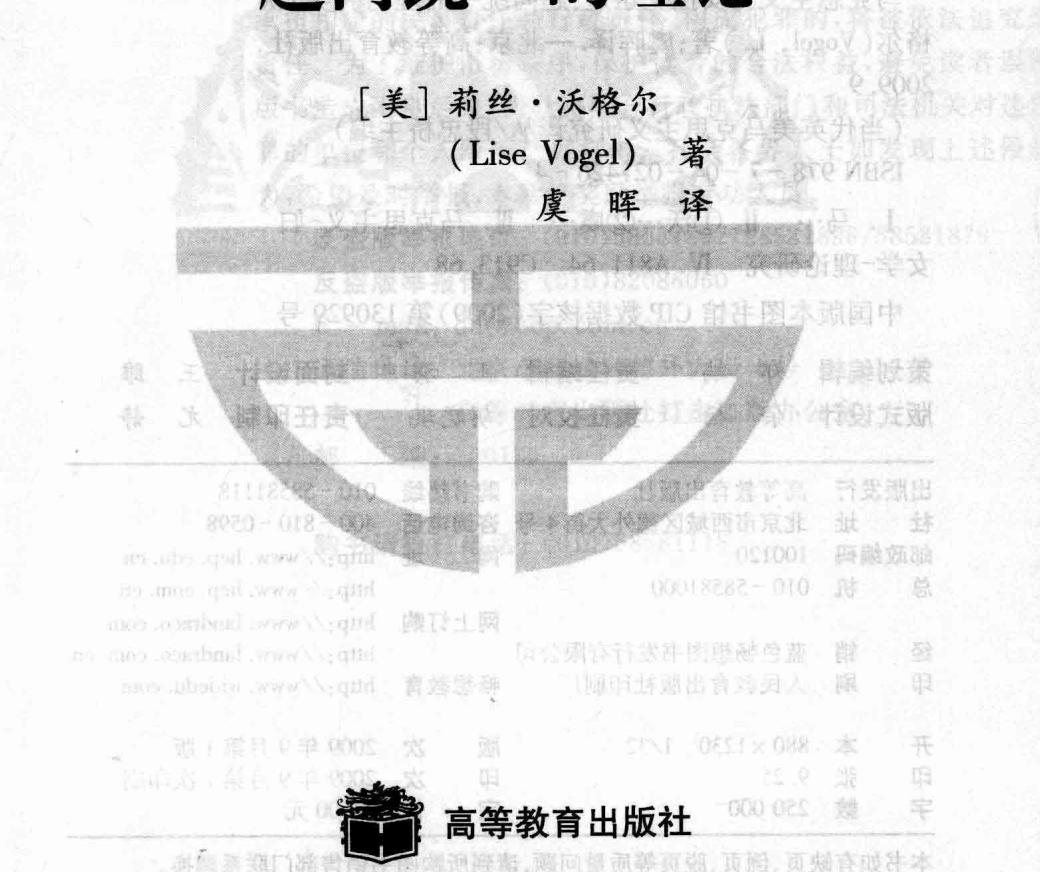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 趋向统一的理论

[美] 莉丝·沃格尔

(Lise Vogel) 著

虞晖 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 7-04-013200-0  
定价：32.00元

开本：880×1192 1/16

印张：6 1/2

字数：

千字

责任编辑：魏海英

责任校对：王春霞

责任印制：王春霞

开本：880×1192 1/16

印张：6 1/2

字数：132000

图字：01-2009-2501号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Vogel, Lise.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Copyright © 1987 by Lise Voge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Piscataway, New Jersey.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美)沃  
格尔(Vogel, L.)著;虞晖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9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段忠桥主编)

ISBN 978-7-04-027426-4

I. 马… II. ①沃…②虞… III. 马克思主义-妇  
女学-理论研究 IV. A811.64 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0929 号

策划编辑 郑 端 责任编辑 王 羽 封面设计 王 睿  
版式设计 余 杨 责任校对 胡晓琪 责任印制 尤 静

---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邮 政 编 码	100120	网 址	<a href="http://www.hep.edu.cn">http://www.hep.edu.cn</a>
总 机	010-58581000	网上订购	<a href="http://www.landraco.com">http://www.landraco.com</a>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a href="http://www.landraco.com.cn">http://www.landraco.com.cn</a>
印 刷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畅想教育	<a href="http://www.widedu.com">http://www.widedu.com</a>
开 本	880×1230 1/32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9.25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0 000	定 价	23.0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7426-00

## 译丛总序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其研究的主要地域开始由西欧大陆向英美转移。这表现在，出现于20—30年代、兴盛于50—60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而在英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受压制从而少有作为的国家，却开始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并逐渐取代西欧大陆而成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地域。对于这一变化，西方学者极为敏感，早在1983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就指出，“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sup>①</sup>翻阅一下近3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

①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研究的相关文献，人们可以发现，自70年代以后，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已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

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同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联系，但却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研究的主题转换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之前的西欧大陆，其主要目标是探索一条不同于俄国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背景决定了其理论研究的两个主题，一是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开始趋于解体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出现的，因而，它更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第二，研究的领域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与所在国的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于他们所在国的共产党在政治上都追随苏联共产党，这种情况迫使他们的研究大多限于远离政治的哲学领域，其研究成果大多是艰深晦涩的哲学论著。相比之下，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是各个学科的知名学者，因此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再限于哲学，而是扩展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

第三，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其代表人物之间彼此缺少理论联系，各讲各的理论和主张。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其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系非常密切，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在理论上的相互沟通和借鉴，而且更表现在他们经常围绕某一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我认为，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阶段，无论从理论意义上讲还是从实践意义上讲，它们无疑都应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

要对象。鉴于我国学者目前对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还缺少了解,我于2003年8月向高等教育出版社思想理论分社社长马雷同志提出了出版一套能反映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成果的译著的想法。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马雷同志积极回应并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因而也就有了这套丛书。

当我决定着手主编这套“译丛”时,所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所选的著作能充分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人虽然多年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和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但仍担心由于缺少直接而及时的信息而出现选择上失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我写信给英美四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即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哲学教授乔纳森·沃尔夫、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伯特尔·奥尔曼和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教授詹姆斯·劳勒,告诉他们我要主编的这套译丛,并请他们各列出20本他们认为最能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这套译丛中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之后选出的。

最后还要强调指出,我们翻译这套丛书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原作者的所有观点和主张,因为它们之中有不少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因此,读者阅读这套丛书时还应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对它们的得失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希望这套丛书能为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段忠桥

2005年12月8日



本书概括介绍了当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情况,简要评价了这些理论作品的观点,仔细审读了有关女性解放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审慎指出了它们的重大贡献和矛盾性,并在此基础上力图构建一个完善的解释女性受压迫问题的理论体系。

沃格尔赞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当代女性在解放斗争中遇到的问题,但并不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留下了关于女性受压迫问题的完整分析,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有很深的缺陷,它不能完全解释女性问题,但马克思主义仍然可以被用来构建一个理论体系,使女性受压迫及女性解放问题在其中有一个合适的位置。沃格尔严格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内提出自己的观点,将女性受压迫问题置于劳动力再生产和总的社会再生产语境中来考察,从理论上分析了女性受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特殊性质,从而为分析女性受压迫的其他具体问题构建了较为稳定的基础。



这一课题开始于十多年前。像 60 年代晚期的许多女性一样,我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之时,正巧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初,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可以被简单地扩展,去解释女性解放论者所关注的问题。但很快,我们意识到,这一结论太机械了,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我们所遇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关于女性受压迫的社会主义著作,需要做彻底的改变。认识到这些之后,一些人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虽然还坚持使用马克思主义,但目的却是发展一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综合理论,以超越社会主义传统理论的不足。我理解这种做法,但我依然坚持初衷——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快,我遇到了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紧要任务。此外,仔细阅读 19 世纪那些关于所谓女性问题的主要文献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理论是相当矛盾的。在过去的几年中,我试图正视并阐释这些问题。本书便是这些思考的结果。一点儿也不奇怪,本书的顺序与我自己在这些

问题上的思想历程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本书开始是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评价，接着是对19世纪文献的批判性审读，最后是对处于总的社会再生产语境中的女性受压迫问题的理论结论。在写作这本书期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解释女性受压迫问题的努力令我更加肃然起敬。尽管我仍然认为，最有可能为即将到来的解放女性的斗争提供理论指导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兴，而不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综合理论的构建。

当我开始研究女性受压迫问题时，马克思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对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的关系进行了评论，并且使用基督教神圣家族作为例子：“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对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该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sup>1</sup>对我而言，马克思的这些词句已经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者理解家庭经验的本质。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者都试图去评论并彻底改造“世俗家庭”——尽管没多少成果。我认为，引发今天妇女解放运动的那些状况，使更完善的评论和更现实的革命终于有了可能性。但可能性从来没有变成现实。早在1971年，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就认为，持社会主义观点的女性解放论者与持激进女权主义观点的女权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斗争，并从这个角度分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现状。我相信，她那时提出的发展建议，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令人信服的：

我们需要充分发展我们的女性意识(feminist consciousness)，同时通过对我们的受压迫进行科学的社会主义分析来改造它。这两个进程必须同时进行——女性意识不会“自然地”发展为社会主义，它也不可能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二者是共存的，必须同时发展。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发展女性意识……我们得到的将不是政治意识，而只是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国家沙文主义，或者工人阶级组织间的经济主义；如果只是简单地不受外界影响地审视自身，我们仅仅能看到一个部分的内部运转情况；只能看到这个部分的自身利益。政治意识则能解释所有形式的

压迫。<sup>2</sup>

正是这一需要——在解释所有形式的压迫的同时，阐述女性受压迫的特殊性质——激发了我的努力。因此，对所有的女性问题，我给出了一个清晰的回答。借用莉莲·鲁宾逊（Lillian Robinson）的诗句<sup>3</sup>：

女性？

是的。

有几篇文章没能被收录进本书，因为我注意到它们时已经太晚了。它们与我的讨论（那些讨论涉及父权制概念的有限范围）以及那些固有问题（性别、种族、阶级都是同样的压迫根源）有关。最近的有关社会历史的作品，强调父权制概念并不足以解释女性受压迫、家庭经验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复杂关联。有关家庭工资（family wage）和职业性别隔离（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y sex）的两篇论文特别有意思：玛撒·梅（Martha May）的《家庭工资的历史问题：福特汽车公司和五美元日》（“The Historical Problem of Family Wage: The Ford Motor Company and the Five Dollar Day”），见《女权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1982年第8期，第399—424页；阿瓦·巴伦（Ava Baron）的《女性和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印刷工无产阶级化的研究》（“Wome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Printers”），见《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第14期，no. 3（1982年秋季号），第23—42页。一些研究纪实性地描述了有色人种女性的历史，分析了种族压迫和民族压迫给女性带来的特别后果，这些研究引发了不同压迫共同作用的问题。比如，杰奎琳·琼斯（Jacqueline Jones）认为，美国种植园时期的奴隶家庭就是支持、自治、抵抗奴隶社会的舞台，同时也培育了父权制家庭关系的种子：《“我的母亲是一位伟大女性”：奴隶制下的黑人女性、工作和家庭》（“‘My Mother was Much of a Woman’: Black Women, Work, and Family Under Slavery”），载《女权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第8期



(1982年),第235—269页。邦尼·桑顿·迪尔(Bonnie Thornton Dill)分析了被压迫团体的历史如何阻碍了社会参与,影响了今天在这些团体中的女性:《种族、阶级和性别:全面妇女团体的前景》(“Race, Class, and Gender: Prospects for All-inclusive Sisterhood”),载《女权主义研究》第9期(1983年),第131—150页。这样的研究揭露了黑人女性对当代妇女运动普遍不信任的潜藏原因,即女权主义者强调性别和种族压迫的相似性,以及女性解放论者倾向于否认种族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特殊性质。通过打破性别、种族和阶级是相同压迫根源的简单平行论,琼斯、迪尔和其他一些人为运动的战略性方向(这一方向为有色人种女性的特别利益而服务)奠定了基础。用迪尔的话说,如果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想要形成能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团结女性的社会变革战略,就必须“超越妇女团体的概念——一个建立在未经检验的[女性]相同性假设基础之上的综合概念”。



在 xiii 我致力于研究这一课题期间,许多朋友和同事给予了我鼓励和有益的评论,我无法在此将她们一一列出。对她们的热情支持我深深感激。在写作较早版本的手稿时,我得益于许多人的评论意见。尤其是李·奥斯汀(Lee Austin)、恩戈·比特纳(Egon Bittner)、罗恩·巴克韦尔(Ron Backwell)、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莫莉·诺兰(Molly Nolan)、夏洛特·韦斯伯格(Charlotte Weissberg)的睿智观点和对那个版本的细致评论使我受益良多。我还要感谢珍妮·巴特菲尔德(Jeanne Butterfield)、马琳·弗里德(Marlene Fried)、希拉·莫菲尔德(Sheila Morfield)、苏珊·奥金(Susan Okin)、蒂姆·帕腾森(Tim Patterson)、雷纳·拉普(Rayna Rapp)、卡罗尔·罗布(Carol Robb)和几个研究机构的成员。当我准备将手稿付诸出版时,吉尔·本德尔利(Jill Benderly)、艾拉·格斯坦(Ira Gerstein)、南希·霍尔斯托姆(Nancy Holmstrom)、贝丝·莱昂斯(Beth Lyons)和苏珊·雷弗比(Susan Reverby)阅读了

大部分手稿，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重复阅读了手稿。她们缜密思考后提出了评论和建议（尤其是在理论论证和政治后果方面），并且非常乐意撰写短评，对此我特别感激。还要感谢鲁特杰斯大学出版社（Rutgers University Press）的员工，特别是坚定支持这一课题的编辑玛丽·沃瑟曼（Marlie Wasserman），以及坚持高标准、有着优秀判断力的文字编辑芭芭拉·韦斯特加德（Barbara Westergaard）。

最后，感谢世界各地女性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她们使得这一理论课题有了意义。没有她们，这一课题将不会存在。



## 目 录

前言	I
鸣谢	I
1. 序论	1

### 第一部分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2. 十年论争	13
3.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与女性问题	30

### 第二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

4. 早期观点	41
5. 马克思:成熟阶段	55
6. 恩格斯:有缺陷的阐述	72

### 第三部分 社会主义运动

7. 第二国际 .....	95
8. 走向革命 .....	106

### 第四部分 从女性问题到女性解放

9. 二元遗产 .....	127
10. 劳动力再生产 .....	136
11. 超越家务劳动 .....	150
注释 .....	174
参考文献 .....	224
索引 .....	250
译后记 .....	275



20世纪60年代,差不多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了妇女解放运动,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都没出现过的现象。激进的女权主义第二波浪潮开始于北美,然后很快扩散开来。首先响应北美行动的是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接着,在日本、印度、伊朗和拉丁美洲等地,一种新的女权主义意识也出现了。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运动虽然还是使人想起早期的女权主义,但它的确是对新的社会状况的特别回应。通常被称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它致力于自觉地融合上述两种传统)的显著趋势的出现,是运动的一个重要特性。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提议者认为自己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学,主张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是相互联结的,这种政治学的目的是解决性别、阶级冲突和种族问题”<sup>1</sup>。

20世纪60年代晚期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浪潮的出现特别重要。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正与反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外的进步斗争团结一致地站在一起。同时,它将自己置于日益激进的女权主义趋势——这种趋势认为,男性统治(male supremacy)是所有人类压迫

的基础和女性解放的主要障碍——的对立面。然而,到7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运动开始失去动力和方向,因为反帝国主义者的行动开始削弱,许多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也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组织中退出——如果不是从整个妇女运动中完全退出的话。现在,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论和组织观点能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提供比以往更多的指导,特别是在有关性、人际关系、意识形态以及男性统治地位在历史上持续存在等关键问题上。同时,女性在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历,似乎更加偏离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当前急务。一种对现存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及当前革命运动主动权的悲观情绪产生了。在这一氛围中,一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屈服了,她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无法用女权主义的方式加以改变或扩展。并且,她们还认为,这样一个目标不仅无法达到,而且会使女性解放屈从于社会主义的需求。虽然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源自于对同时实现女性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但这种双重支持现在却迫使二者分离。

本书提出的论点赞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今天女性在解放斗争中遇到的问题。然而,它强烈反对许多社会主义者的以下假想,即经典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留下了关于女性受压迫问题的完整分析。在这一意义上,本书可被看做是一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作品,尽管它既不同意当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效用的怀疑态度,也不赞同她们对激进女权主义观点的高度期望。相反,本书认为,社会主义传统思想有很深的缺陷,它永远不能完全解释女性问题,但马克思主义仍然可以被用来构建一个理论体系,使女性受压迫及女性解放问题在其中有一合适的位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力量和特征大增,其中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力量和特性亦大增,这大部分是因为战后的独特环境。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统治经历了重大转变,而权力结构也在经历着深刻变革,二者均发生在每个国家内部以及国际间。女性,不管属于哪一阶级,很快都将面对剧烈改变的任务、前景和矛盾